

國立政治大學《史薈》第 58 期

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四年(2025)七月

周怡齡老師專訪

史薈專訪組

主訪：黃靖凱；副訪：李承亮、鄭子卉

撰稿人：鄭子卉

逐字稿：李承亮、黃靖凱

訪談時間：2025 年 4 月 1 日下午 2 點



周怡齡老師背景

周怡齡 (Catherine Lila Chou) 老師，出生於美國加州臺灣裔家庭。2006 年取得普林斯頓大學 (Princeton University) 歷史學士學位，大三時曾到英國劍橋大學 (University of Cambridge) 交換，在劍橋學習過程對她影響深遠，因此老師大多研究歐洲史，特別是近代早期英格蘭與歐洲歷史、啟蒙運動、現代英國與帝國等相關。老師也在 2016 年 12 月於史丹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。畢業論文為“Parliament in the Elizabethan Political Imagination, 1558-1603”。¹

2016 到 2017 年在維拉諾華大學 (Villanova University) 進行博士後研究、2018 到 2024 年 7 月任教於愛荷華州格林內爾學院 (Grinnell College)。2024 年 8 月始於本系任教。其他著作包括：*Parliament in the British Political Imagination, 1550-1600*，²*Revolutionary Taiwan: Making Nationhood in a New World Order* 等。³

¹ Catherine Chou, “Parliament in the Elizabethan Political Imagination, 1558-1603,” (California: Ph.D. dissertation, Stanford University, 2016), 303 pages.

² Catherine Lila Chou, *Parliament in the British Political Imagination, 1550-1600* (under contract with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). (本書即將出版。)

³ Catherine Lila Chou and Mark Harrison, *Revolutionary Taiwan: Making Nationhood in a New World Order* (New York: Cambria Press, September 2024), 210 pages.

「我不覺得我回到臺灣，而是搬來臺灣。」現任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的周怡齡老師，透過與史薈專訪小組的對談，周老師得以與大家分享自己從美國學術圈轉戰臺灣高教現場的經歷，以及在家庭與教育環境的拉扯中，對自我認同的定位。

一、移民家庭子女的成長與認同

老師成長於美國加州，家中父母是 1980 年代自臺灣移民的留學生，因政治立場選擇離開戒嚴時期的臺灣。「我爸爸 1983 年出國...他那時候畢業演講是故意的，就是主張臺灣要民主化。」但她的父母一開始並沒有計劃長留美國，是在三個孩子出生後才逐漸落地生根。雖然生活在美國，但父母在家中仍會使用臺語與中文，並送她去上僑委會開辦的中文學校，⁴不過學校教授的內容與家中從小教給她的觀念卻產生了明顯落差。「第一堂課，其實就是想要教你...我們都是中國人，我們都是海外的中國人。」這樣的訊息與她從小認知的「我是臺灣人。」的觀念產生衝突，讓她從小便敏感地察覺政治意識形態對於教育環境的影響。而且她也坦言，小時候並不特別喜歡學中文，僑校的課程每週僅有四小時，長期下來頂多達到國小二或三年級的程度，而在主流學校裡，則是徹底的全英文環境：「要保留母語或是學習、閱讀母語的話，非常困難。」

⁴ 僑委會在臺灣位於台北市徐州路五號三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樓。負責海外僑民事務例如僑民管理、僑民教育等。

二、就讀歷史系的契機

怡齡老師從小就喜歡閱讀，尤其沉浸於英文書寫的世界中，父親的中文藏書對她來說則是完全無法理解的密碼。「我完全都是用英文讀的...很喜歡讀書、看書。」到了大學，儘管對語文、文學懷有熱情，她卻選擇進入歷史系就讀，理由出乎意料的是「可以出國留學。」於是在大三那年，她前往英國劍橋大學（University of Cambridge）交換，第一次體驗英式教育獨有的 tutorial system。⁵「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教育可以這麼不一樣。」在一對一討論中，她不再只是坐著聽課，而是要不斷閱讀、思考、寫作，再帶著想法與導師碰撞，這段經歷也深深影響了她日後的教學方式。

三、在劍橋的學術啟蒙

老師回想起在劍橋的那一學期，坦言自己幾乎過著「尼姑一樣」的生活，「因為每個禮拜要讀文書，還要寫八到十頁的文章，我快瘋掉。」她苦笑說當時非常努力，完全捨棄了旅遊與社交，只為在一對一的 tutorial 中留下好印象。「你要自己想辦法可以一個禮拜內，怎麼把五本專書讀完。」相較之下，她形容美國大學的學習模式比較被動。「你可以靠你同學啊...可是在這種一對一的 tutorial 的話，其實只有你可以依靠自己。」為了讀懂 16 至 17 世紀的原始史料，她更學會了法文、西班牙文，甚至挑戰過極具難度的拉丁文。然而這趟艱辛的留學之旅，卻意外點燃她對研究的熱情。

⁵ 以老師交換的劍橋大學為例子，劍橋其中有一個 tutorial system 叫 supervisions。Supervisions 就是導師會和學生討論所學的內容。學生必須在此前閱讀、撰寫。或者解決相關問題。參考自 University of Cambridge. "How you will learn." <https://www.undergraduate.study.cam.ac.uk/courses/teaching-supervisions>, accessed May 16, 2025.

四、教學挫敗與迷惘中的自我摸索

但是在大學畢業後，怡齡老師很快就面對到現實帶來的種種瓶頸。在結業後她並未直接申請博士班，⁶而是參與了 Teach for America 計畫，⁷被派往洛杉磯的公立中學教授數學與自然科。然而這段教學生涯卻讓她嚐盡了苦頭。

「我沒辦法想像為什麼小孩不會聽老師的話呢？」怡齡老師無奈的說，她認為自己完全不具備 classroom management 的能力，並決定離開中學教育的職場。她也想過轉換跑道，曾短暫就讀過法學院，但沒多久便退學。「我上了還不到一年就決定要退學。因為我對法律超沒有興趣，也覺得很困難。」那段時間，她形容是自己的人生「quarter-life crisis」，迷惘、不知所措，也不確定人生該往哪裡走。

⁶ 在美國比較常見博士班可以直接申請，無需報讀碩士班。然後碩士跟博士一起讀。前面兩年會像學士班那樣修課。第三年開始擔任助教或準備 oral exam 或 general exam。第四年開始準備研究、開始寫博士論文。之後就寫到論文寫完為止。過程會花五到七年。

⁷ 該計畫通過尋找、培養和支持傑出的領導者來改變教育，借此提供更多機會給兒童。並提倡教育工作者、政策制定者、家長和學生共同努力，確保社區孩子擁有學習、領導、茁壯成長所需的基礎，塑造他們和所有人更美好的未來。參考自 Teach For America. “What is Teach For America?” <https://www.teachforamerica.org/about>, accessed June 1, 2025.

教學挫敗與法律退學的雙重打擊下，她一度陷入長達一年多的低潮期。「就有一點不太知道自己應該走哪個方向。」她說。就在徬徨之際，怡齡老師忽然想起：「上一次感覺超開心是什麼時候？」答案出乎意料地簡單——是大學大四寫畢業論文的那段時光。「這個研究跟寫這個論文的經驗，其實給我一種...對自己很滿意的感覺。」那份來自閱讀與思考的充實，成為她重新走入學術界的契機。

五、重拾學術研究

於是她開始準備博士申請，踏上長達七年的研究旅程，輾轉英國與歐洲多地查找史料、進行田野調查，最終完成博士論文。⁸其中怡齡老師提到，幫助她最多的博士指導教授，⁹對她來說就像 *fairy godfather* 一般，在她低潮之際錄取她，更在她屢次延遲交報告、進度緩慢時始終耐心等待，持續鼓勵她走下去。「就是因為他願意接受我.....願意把我錄取到這個 PhD program，我整个人生都改變了，所以我對他非常、非常尊重，非常感謝。」

⁸ Catherine Chou, 2016, "Parliament in the Elizabethan Political Imagination, 1558-1603", 303 pages, Stanford University, Department of History.

⁹ David Como, 史丹福大學歷史學系教授，其專長包括宗教和宗教改革（History of Religion and the Reformation）、清教徒政治（Puritanism, Politics）、英國革命（English Revolution）等。其著作例如：David Como, *Radical Parliamentarians and the English Civil War*(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18).

六、學術職場的現實

然而在取得博士學位後，怡齡老師卻遭到沉重的打擊：「我申請了 75 個教職，只錄取了一個。」她形容學術就業市場「像金字塔一樣，甚至像 pyramid scheme 一樣——像詐騙一樣。」¹⁰大多數學術職位都是兼任、不穩定，沒有保險、沒有退休金。在頂端職位稀少，底層缺乏保障體制下，為了能在學術圈立足，她在麻州（Massachusetts）、愛荷華（Iowa）州等地間奔波，從博士後到臨時教職，一步步累積經驗。

七、反思大學教育的價值

雖然她的研究重心是早期近代歐洲歷史，但當她發現自己在大學時期其實曾上過相關課程，卻完全不記得，這件事讓她啞然失笑。「我博士畢業以後回去...要提供大學成績單，然後發現第一個學期有上這個近代早期歐洲歷史的課，完全沒有印象。」從課程內容、教授名字到使用的教科書，全部沒有印象，她認為，這也反映出大學教育的另一層意義「內容也許容易遺忘，但希望留下來的是加強學生的批判、思考能力啊，或是加強學生的閱讀分析能力啊。」

¹⁰ Pyramid scheme，中文又稱層壓式推銷或老鼠會。

八、宗教與王權：她所關注的歷史

而怡齡老師轉向歐洲歷史研究的關鍵，是她在劍橋大學留學期間，選修了一系列早期近代歐洲與英格蘭歷史的導讀課（tutorial），她原本對美國史比較感興趣，但英國的課程結構與知識脈絡啟發她深究另一片歷史場域，也逐漸形塑出她日後的研究方向。

她的博士論文聚焦於16世紀下半至17世紀的歐洲政治思想與繼承危機，尤其著重探討在宗教改革之後，民眾與知識分子如何判斷一個政府是否具有合法性。「我其實最有興趣的一個問題是說，民眾或是高級知識分子，怎麼樣判斷政府的合法性還是非法性。」這樣的提問，讓她進一步探討宗教如何在政治判斷中成為核心依據。

她指出，宗教改革前的歐洲幾乎處於天主教會的宗教統一體系，君主合法性主要來自世俗繼承與教會認可。但宗教改革以後，一個國王若信仰錯誤的宗教，可能就會動搖他在臣民心中的正當性。「因為臣民可能會開始希望他們的君主和他們信仰同樣的宗教。」宗教成為判斷政治正當性的準繩，這種政治理念的變化，在她看來，是歷史中極具張力的一段。英國國會的角色也因此變得複雜。她的研究發現，在繼承危機與宗教矛盾夾擊之下，一些菁英開始主張讓國會參與原本屬於君主專權的繼承安排。「是不是可以給國會新的角色、新的任務？」政治想像開始被擴張，過去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王權，也因此進入公共討論的領域。這些辯論與手稿，成為她研究的重要材料，也揭示出思想與制度之間微妙的交織。

九、疫情下重啟：重新認識臺灣

直到COVID-19疫情爆發，讓她終於有機會停下腳步，當時她正在美國教書，課程全面改為遠距，由於臺灣當時的疫情控制得很好，反而讓她多了一次機會回到這片熟悉卻又陌生的土地。「我不是算是回來臺灣，我是搬來臺灣，就是半新移民的感覺啦。」怡齡老師強調。原以為只會停留半年，沒想到一待就是一年半。白天，她凌晨起床，線上授課給美國的學生；下午，則投身語言課程，一週上八小時的中文與臺語課。那段時間，怡齡老師不只是學語言，也深入走訪臺灣各地，甚至登上外島，那也是她第一次真正以生活者的身分認識這片土地。她也發現，與她有相似背景的臺灣美國人也趁機回流，「至少有幾百個、可能幾千個跟我一樣背景的人那時候來臺灣。」他們有的是遠距工作者，有的是中文學習者，也有像她一樣，開始思考是否將「原鄉」變成「居所」。

十、在政大的教學生涯

也因為疫情，她與曾經的大學朋友重新聯絡並結婚，決定在臺灣定居，經歷了一連串求職的艱辛，老師最終順利取得了政大歷史系的教職，怡齡老師更謙虛地說：「不是我選政大，是政大選我。」

在臺灣成家立業、進入政大任教後，她已不再是那個在洛杉磯教初中時備感挫折的新手老師。她說：「剛開始的時候，其實很有實驗性的感覺啊。多多少少也會緊張。」在美國的教學經驗讓她意識到，一位老師真正的任務，不只是知識的傳授者，而是訓練學生思考與表達的同伴。她認為理想的師生關係應是彼此信任、互為夥伴，而非上下階層式的指導與服從。「如同我導師就是覺得他可以幫我訓練成為一種同仁啦。」

即使現在已離開博士訓練多年，她仍不時與導師保持聯繫。「雖然我畢業已經快 9 年了，我還是覺得他還是在支持我啦，非常、非常、非常感謝他。」這份從「受教者」走向「引導者」的過程，也讓她格外珍惜學生階段遇見的每個人。